

朱伯崑 著

易學哲學史

第三卷



# 易学哲学史

第三卷

朱伯崑 著

华夏出版社

1995年·北京

## 第 四 编

# 元明清时期

## 目 录

## 第四编 元明清时期

第八章 宋易的繁荣和理学的衰落	(3)
第一节 元代象数之学	(11)
一 雷思齐《易图通变》	(14)
二 俞琰《易外别传》	(33)
三 张理《易象图说》	(42)
四 肖汉中《读易考原》	(67)
第二节 明代义理学派的易学哲学	(77)
一 薛瑾的易说	(81)
二 蔡清《周易蒙引》	(106)
三 罗钦顺的易学哲学	(137)
四 王廷相的易学哲学 (附何塘《阴阳管见》)	(164)
第三节 明代心学的易学哲学	(194)
一 湛若水的易说	(198)
二 王畿的易说	(216)
三 禅宗的易说	(247)
第四节 明代象数之学的发展	(268)
一 来知德《周易集注》	(272)
二 张介宾《医易义》	(310)
第五节 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	(336)
一 论象数之学	(349)
二 易学中的哲学问题	(426)



## 第八章 宋易的繁荣和理学的衰落

元明两代是宋易及其哲学深入发展的时期。两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经过元明易学家和哲学家的阐发，到明末清初发展到高峰。宋易及其哲学，特别是宋明道学，作为经学史和哲学史的一个历史阶段，至清初而告结束。

元明易学哲学的发展也有其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元朝建立后，蒙古族统治者，为笼络汉族势力，启用一批汉族学者，大力提倡儒学。据《元史·选举》记载，元仁宗皇庆年间，王朝规定科举考试科目以朱熹注为标准答案。从此，程朱理学成了官方的经学。黄宗羲说：“至于有元，许衡、赵复以朱氏学倡于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非能知朱氏也，不过以科目为资，不得不从事焉。”（《宋元学案·静明宝峰学案》）。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亦徵召儒家学者，讲论道德，修明治术。至明成祖朱棣命胡广等人编纂《四书五经大全》，用程朱注，作为明代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朱棣还命胡广等人编《性理大全》，将周、程、张、朱诸家言性理之书类聚成编，成祖为之作序，宣布程朱理学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哲学。明代科举考试还推行八股文，四书义和经义大都用程朱注。《大全》的颁布是经学史上的—件大事，标志着宋代的经学即宋学终于代替了汉唐经学《五经正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对明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明末学者顾炎武评论说：“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饔利禄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日知录·四书五经大全》）又说：“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

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同上·书传会选》）顾氏此论，是站在实学的立场对明代官方经学的抨击，有其时代的意义，但也表明程朱派的经学同科举和八股文结合后，成了士人学子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终于走上僵化和衰颓的道路。

元明两代官方倡导的经学，对易学哲学的发展同样起了很大的影响。就易学史说，朱熹的《周易本义》成了官方认可的权威性的典籍。元明两代先后涌现出一批注疏《本义》的著作。如《四库》所收元人胡一桂所著《易本义附录纂疏》和《易学启蒙翼传》，以朱熹的《本义》为宗，取《朱子文集》和《语类》中讲易理者，作为附录；取儒家各派之易说合于《本义》者作为《纂注》；并于《翼传》中解说朱熹所肯定的象数之学。其子胡炳文又著《周易本义通释》，其学生董真卿著《周易会通》，皆阐发朱熹易学。胡一桂颂扬朱熹说：“有天地矣，可无易乎？不可也。有易矣，可无本义，启蒙乎？金声玉振集大成，众言蔽乱折诸圣，朱夫子其圣人之徒与？”又说：“朱子勃兴，探前圣之精微，破俗学之纆妄，本义、启蒙作，而后吾易始明于世。愚尝谓孔圣以来，朱夫子有功于易，断断乎其不可及已。”（张溥《易经注疏大全合纂·五赞》引）“俗学之纆妄”，指刘牧的图书学，林栗的互体说以及麻衣易等。他奉朱熹为当代的孔圣人。胡氏父子对《本义》的纂疏和通释，皆笃守朱熹义，建树甚少，但对明代的官方易学的形成颇有影响。明胡广等奉成祖命所编的官方易学著作《周易大全》，即取材于胡氏著作。朱彝尊《经义考》评论《大全》说：“广等就前儒成编，杂为钞录，而去其姓名。易则取天台、鄱阳二董氏，双湖、云峰二胡氏。”天台董氏即南宋董楷，著有《周易传义附录》，合程氏《易传》与朱熹《本义》为一书，而采两家易说附录其下。鄱阳董氏即董真卿，双湖即胡一桂，云峰即胡炳文。朱

氏所论甚是。《周易大全·凡例》说：“诸家之说，一宗程传、本义折衷，并取其辞论之精醇，理学之明当者，分注二氏之后，以附羽翼之，而其同异得失，先儒双湖胡氏，云峰胡氏，尝论订者，亦详择而附著焉。”此书实际上是以胡氏所著书为蓝本，并钞录各家易说，断以程朱义而成编。《四库总目提要》评论此书说：“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录存其书，见有明儒者之经学，其初之不敢放轶者由于此，其后之不免固陋者，亦由于此。”此书颁布后，以前的注疏尽被废弃，成为王朝认可的唯一的易学典籍。此书所引诸家注有一百三十家，始于汉代孔安国，终于元代鄱阳董氏，而以程氏《易传》和朱熹《本义》为纲领，实为宣扬程朱派易学著述的资料汇编。其钞录程朱义和诸家说，亦多割裂其内容，并无学术价值。顾炎武评论说：“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腾一过，上欺朝廷，下逛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日知录·四书五经大全》）所论颇为中肯。此书虽无学术价值，但影响很大。其颁布和流行，意味着程朱派的易学，特别是朱熹易学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士人所尊奉的教条。明初以来有见识的易学家和哲学家，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中的学者，正是通过对《大全》的反思和评论，察觉到理学派易学的流弊，从而走上修正或反对程朱理学的道路。

就哲学史说，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哲学，到了元代，由于王朝推崇程朱理学，其它流派受到压制，理论上很少创新。明朝永乐年后，程朱学说进一步被官方尊为正统哲学，理学终于走上停滞和僵化的道路。《明史·儒林传》说：“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此论虽不符合明代哲学发展的全貌，但程朱理学确乎是江河日下，丧失了其生命力。在明代，凡恪守程朱教义而不敢有所异同的儒家学者，在



哲学上可以说是皆无贡献。官方颁布的《性理大全》，本欲定学术于一尊，其结果却引出了自己的对立面，激起了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潮。这一思潮，明中期以后，迅速发展，形成了明代哲学的繁荣时期。就程朱学派说，自《大全》颁布后，其中追求真理的学者，因受气论哲学，特别是张载学说的影响，对理学的一些基本命题，重新检讨，因而从程朱学派中逐步分化出来，将理本论引向了气本论。此种分化，始于薛瑄，经过蔡清到罗钦顺，终于建立起气本论的体系。在这条路线的影响下，明代涌现出一批阐发气论哲学的学者和大师，如崔铣、黄佐、王廷相、唐鹤征、方以智和王夫之等，而王夫之则是完成气本论的殿军。如果说，以张载为代表的气论哲学，到南宋被朱熹的哲学所吸收，在理本论的冲击下，没有得到发展，到了明代，理学派和气学派中的学者，又通过对朱熹理本论的批评，吸取了程朱体用一原的观点，又完成了气学本体论的体系。同宋代的哲学相比，明代可以说是气学派的形上学和本体论流行和发达的时期。

此外，由于理学走向僵化，南宋以来的心学又流行起来。明代心学的兴起，同样出于对官方经学和哲学的不满。《明史·儒林传》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明代心学始于陈献章即陈白沙。其后心学分为湛若水和王守仁两大派。明中期以后，湛王两家心学又分化为许多支派，成为与官方理学相抗衡而影响甚大的思潮。心学兴起后，同理学和气学展开了大辩论，传统说的朱陆之争，达到高潮。明代心学也有自己的特点。湛王两家都从理本论和气本论中吸取营养，阐发南宋以来陆、杨所建立的心学体系，使心本论的理论思维完善化和精致化。明代也是心学派的自体论流行和发展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明代的心学吸收了气学的观点，后来从心学派中分化出气一元论的倡导者；

成为气学派的同盟军。由于陆王心学受佛教禅宗影响较深，心学派的佛家中又出现了儒佛合一论者，在思想界掀起了儒佛异同的大辩论，进一步促进了心学的分化。心学由此走上衰落的道路。

总之，自《大全》颁布后，理学、气学、心学和佛学四大流派相互论争。各派之间不仅相互批评，而且自我反思，进而相互渗透，从而将古代哲学中的本体论推向新的水平。哲学史家黄宗羲评论明代儒家哲学的贡献说：“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明儒学案·凡例》）“理学”指道学，非指程朱理学。黄氏此论，是就儒家对佛学的批判而言，认为明儒超过了宋元学者。但他所概括的“牛毛茧系，无不辨析”，却道出了明代哲学家的理论思维的水平；即重视和善于分析问题，对哲学中的概念，命题以及理论思维的内容和形式，都深入辨析其异同。这也是宋学重视义理所产生的积极成果。明代各派哲学经过长期的论争，程朱理学由停滞而解体，陆王心学由兴盛而分裂，而气学派的哲学，在同理学和心学的斗争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体系，终于以其理论的优势，压倒对方，作为宋明哲学发展的丰硕成果而影响于后世。

上述元明哲学发展的过程和轮廓，同这一时期易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就形上学和本体论说，各派的论争是围绕着遣器、理气、理事、心物、心理、心气、心性以及太极等问题而展开的。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主要是通过《周易》经传的解释。易学成了各派论证和阐发自己哲学体系的主要依据。元明易学，就其解易的基本倾向说，仍分为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两大流派。就其解易的原则说，义理学派又分为理学、气学和心学三派；象数学派分为数学和象学两派。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虽被官方

定为易学的正统，但易学中的派别斗争，并未因此而终止，相反，更加复杂和深化了。斗争的焦点是易学中的理、气、象、数、心五大范畴那一个最为根本，从而各自建立起不同的易学体系。

就象数学派说，由于朱熹易学并不一概排斥象数之学，元明两代的河洛之学和邵雍的先天易学，在朱熹易学的支持下，皆有所发展。特别是邵雍的易学，被象数学派视为解释《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体例之一。元代的象数之学颇多创新。易学家雷思齐，继宋代张行成之后，主有数而后有象，成为数学派解易的代表。而俞琰、张理和肖汉中等，主有象而后有数，又发展了象学的传统。到了明代，象学一派成了象数之学的主流。此派易学不仅主取象说，而且兼论理和数，同程朱派的取义说展开了斗争。著名的易学家来知德即其代表人物。其后，方以智父子解释《周易》经传，继承了象学的传统，又吸收了数学的观点，对元明以来的象数之学作了一次大总结，标志着象数之学发展的高峰。元明两代的象数之学，提倡以象解易，因而提出许多图象解说其易理，又形成了易图学。易图学是宋代图书之学的新发展。象学派继承了汉易以来的卦气说，提出象气合一，象理合一，并以气为象、数、理的根据，从而阐发了气论哲学，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传统，丰富和发展了气本论的理论体系。此派易学还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起来，或援引天文、地理、物理、医学和算学等知识解说其易理，或以其象数原理总结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的成果，从而推动了气论哲学的发展。他们还提出许多世界模式解释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成为古代自然科学理论思维的阐发者。总之，元明两代的象数之学，对宋明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不容忽视或抹煞的。

就义理学派说，程朱易学虽然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其取义说，不足以解释通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联系，不能回答《易传》中取象

说的体例，因而受到一些易学家的指责。此种指责，元代已开其端。当时南方大儒吴澄，亦传授程朱之学，但他对《周易》经传的解释，一决于象，主理在象中，从而在哲学上阐发了理不离气说。到明代薛瑄解易，因受张载易说和元代象学的影响，提出象理合一说，在本体论上断言理气无先后，为理学向气学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其后著名的易学家蔡清，其解易虽主义理，因受薛瑄易说的影响，亦主理象合一，从而批评了朱熹易学离气言理的观点，在哲学上走向气本论。哲学家罗钦顺又受蔡清易学的影响，进而提出理气为一说，公开批评了朱熹的理本论。由于他们在易学领域主理寓于象中，从而逐渐从理学派中分化出来，成为气本论的倡导者。明代气论哲学的代表人物王廷相，继承了张载易学哲学的传统，关于理、气、象、数的关系，主张有气方有象，有象方有数，有气方有理，既反对了程朱派的理本论，又反对了刘牧、邵雍一派的象数之学，在哲学上捍卫了气一元论。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站在义理学派的立场，继承了义理和象数两派中以象解易的传统，在哲学上全面阐发了气本论，为宋明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象数之学的象学派和义理之学的气学派，由于其对《周易》原理的解释存在着共同点，在哲学上形成了同盟军，成为明代反对理本论和心本论的强大势力。

义理学派中心学一派，以心为易，以内心修养方法和精神境界解释《周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辞，哲学上主天人一本，即天人无差别，导出人心为世界本体的结论。为了论证其心本论，湛王两家易学都辩论了理、气、象、数同心的关系。他们依前辈心学的道器合一说，亦主理气合一；依其取义说，主有理而后有象。其谈理气问题，与气学派相通；谈理象问题，又与理学派相通。但最终又将理、气、象、数的根源归之于人心，即道德意识，进而提出心为太极或良知为太极说，完成了心本论的哲学体系。明代

的心学，因受气学的影响，又提出心气合一或心气为一说，以此论证其天人一本的命题。正因为如此，后来又从心学中分化出气一元论的倡导者。由于明代陆王心学通过《周易》经传的解释，宣扬其修养方法，佛教禅宗中的儒佛合一论者，又按佛家的观点解释《周易》经传，形成了禅宗的易学。此派易学利用卦爻象和卦爻辞讲禅宗的修养经，并且提出真如太极说，以丰富禅宗的心本论。

总之，元明以来各派哲学的发展，就其形上学和本体论说，都同易学及其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脱离这一时期的易学哲学史，很难深入了解宋明道学包括理学，气学和心学三大流派在明代演变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元明两代易学和哲学的发展，同当时社会的变化也有一定的联系。后期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中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矛盾加深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也不断激化，明王朝从此由兴盛走向衰落。面临社会危机的加深，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由于走上僵化的道路，已不能应付当时的社会危机，这样，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便出现了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潮。气学的流行和心学的兴起，在当时都是作为理学的对立面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心学的流行同样未能解决王朝面临的危机。明朝末年，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明王朝终于灭亡了。由是思想界和学术界又掀起批判陆王心学的思潮。方以智父子和王夫之的易学哲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不仅促进了道学的解体，也标志着宋学的终结。

元明两代的易学著作是十分丰富的。《四库》所收共四十七部，存目者有一百五十九部。其中绝大部分为明人解易的著作。《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易学著述有一百九十家。此表明元明两代

也是古代易学繁荣的时期。本节所论易学哲学的历史，以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易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为主，以哲学问题为纲，其它则从略。关于王夫之的易学哲学，则于次章讨论。

## 第一节 元代象数之学

《四库》所收元代解易著作有二十家，有解赛程朱义者，有阐发河洛之学和邵雍先后天易学者。但义理学派的著述，其对《周易》经传的解释，除依程朱义外，在哲学和理论思维方面，很少建树。而象数之学，通过对河洛图式和邵雍的先后天图式的解释，则颇多创新。元代阐发象数之学的，不但是象数学派的学者。由于朱熹不废象数，于《本义》中肯定河洛图式和邵雍的图式作了肯定，即使程朱派易学家也研究象数之学。胡一桂于《易学启蒙翼传序》中说：“邵雍之学，已见朱熹，继承刘牧之谬者有之。古义已复古矣，复循王雱之流弊者有之。然象数均如丹青矣，复祖尚玄旨者又有之。是皆非正容于得己也。”故日月图书之象数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因此，在其著作中，继南宋朱震之后，研究了从汉京房到宋刘牧、邵雍的象数之学，虽然贡献不多。元代讲象数之学的，也不限于儒家学者。道教学者，继承陈抟易学的传统，亦研究象数之学，儒家学者亦有人依象数之学解说道教的典籍。就易学史说，元代的象数之学较为发达，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对后世的影响亦较大，故立专题加以评述。

宋代的象数之学已分为数学和象学两支。这两支对元代的象数之学皆有影响。元代的易学家研究象数之学造诣较深或有独到见解的，有俞琰、雷思齐、张理和肖汉中。俞氏是朱熹的后学，但他重视象数学派的理论，依邵雍的先天学重新解释《周易参同契》，将汉易以来的卦气说，引向人体结构说。雷思齐为元代道教

大师，继承了刘牧、邵雍的易学传统，以九宫图为核心，解释《周易》原理。张理乃吴澄后学，将河洛之学，先后天学以及《太极图说》揉合在一起，提出一个以阴阳五行为间架的世界图式，成为元代象数之学的代表。肖汉中研究了卦序问题，以六十四卦象的逻辑结构解释《周易》卦序的程序。雷思齐的易学属于数学，其他三家属于象学。他们各自提出不同的图式，并且同天时节气的变化和人体脏腑血脉的分布结合起来，解释其易理。此种学风对明代易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思维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影响。

就哲学说，元代易学家所辩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河洛之辨。朱熹派以河为十，洛为九；刘牧派以河为九，洛为十；或者反对以河洛图式解易。二是象数之辨。数学派主张有数而后有象，象学派则主张有象而后有数，而程朱派则主有理而后有数。三是象理之辨。程朱派坚持取义说，主假象以显义，有理方有象；而受象数之学影响的易学家则主取象说，反对离象言义，主理寓于象。后两个问题乃象数之学同程朱易学争论的焦点。在这场辩论中，元代大儒吴澄支持象学的观点，其易学观对象数学派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

吴氏亦著名易学家，著有《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其注解《周易》经传文，多本朱熹义，但他主取象说，对象数之学颇感兴趣。《四库总目提要》评论说：“自唐定正义，易遂以王弼为宗，象数之学久置不讲。澄为纂言，一决于象，史谓其能尽破传注之穿凿，故言者多宗之。”认为吴氏易学不尽同于程朱说。吴氏论取象说：“牺皇所画之卦画谓之象，文王所名之卦名谓之象，彖辞爻辞泛取所有之物亦谓之象。”（《易纂言外翼·象例》）按此说法，《周易》的内容，取决于象。关于卦画的起源，亦主观象说。他说：“牺皇八卦之画，象天地八物，则谓八卦之画为象。”（《易纂言·象上传》）此说不同于朱熹。他对河图洛书，邵雍的先后天

方图诸图以及卦变、互体等皆有解释，虽创见不多。其取象说，对其易学哲学颇有影响。如其释“易有太极”章说：“易谓阳奇阴偶互相更换而为四象八卦也。……易有太极，谓一阴一阳之相易有理以为之主宰也。”（《易纂言·系辞》）此说本于朱熹义。但他认为太极之理并不脱离阴阳二气。他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说：“阴阳气也，道者理也。然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即是气为之主宰者，道也。”（同上），这是对朱熹的“理与气决是二物”或“二物浑沦”说的一种扬弃。因此，其论理气关系说：“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曰阴阳。又就阴阳之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这是主张理在气中，理气并非二物。如其所说：“太极与此气非有二物，只是主宰此气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同上）此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赞成理先气后说。他说：“理在气中，原不相离。老子以为先有理而后有气。横渠张子诋其有生于无之非，晦庵先生诋其有无为二之非，其无字是说理字，有字是说气字。”（同上）朱熹说，见其《文集》、《答杨子直》和《答程可久》。朱熹原意是批评老子的有生于无说，吴澄则理解为理只能存于气中，不在气先。此种理解，实际上是对朱熹的理先气后说的一种扬弃。他所以主张理在气中，就其易学思想说，由于主取象说，故以天地阴阳之气解释阳奇阴偶卦画。如他以乾为天，以“原其气之所始则出于天‘解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见《易纂言》），从而在理气问题上，不赞成别理气为二物。正因为如此，在道器问题上，亦主张二者不可分割。他说：“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虽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无间，未始相离也。”（《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先儒，指程颢。



吴澄易学不属于象数学派，但由于他受象数之学的影响，深入研究象数问题，从而对程朱派的易学哲学，特别是朱熹的哲学有所修正，成为明代的理学向气学转化的先驱。

吴氏的取象说，在元代颇有影响。关于象和义的关系，元黄泽说：“易起于数，因数设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辞……圣人言易之为教如此，易不可废象明矣。”（《宋元学案·草庐学案》）黄泽为吴澄同调，学术上相互影响。他提倡象学，反对离象言义。其所著《易学濫觴》，论象学说：“所贵于象学者，可以辨诸家之得失，凡纷纭错杂之论，至明象而后定。”关于象和数的关系，他说：“象与数不可相离，象为主而数为用。如天是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数。日月是象，一日一度，一月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数。天与日月运而为春夏秋冬，又积为元会运世。天与日月是象，春夏秋冬，元会运世是数。易之有象数所以法天。卦主象而著主数，二者相须，但象有定而数无穷，故成变化行鬼神，必归之数也。”（《易学濫觴》）此是以象为体，数为用，主张有象而后有数，是对数学派易学的一种批评。黄氏所论表明，象数和象理之争乃当时易学中的大问题。象学派提出的以象解易的原则，既反对数学派的观点，又不赞成程朱派的取义说，代表元代易学的新方向，对明代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影响。

### 一 雷思齐《易图通变》

宋代的象数学派分化为象学和数学两支。关于数学一支，除邵雍、蔡沉外，还有张行成。张氏易学，本书第二册于邵雍一节已提及，并未评介其内容。因其对元明两代象数之学有影响，这里，略加追述。

他著有《述衍》、《皇极经世索隐》、《观物外编衍义》、《易通